



doi: 10.3969/j.issn.1672-5956.2013.02.012

徽商的“贾儒相通”观和儒商化取向探析

郑小娟 张淑芳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济南 250014; 山东工商学院 社会科学教学部, 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 徽州人的“贾儒相通”观对他们走上从商道路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徽商们是普遍带着“贾儒合一”的追求而从商的,他们的最终的目的,是要由商转化为儒,所以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应是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

[关键词] 徽州; 商人; 儒者

[中图分类号] F0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956(2013)02-0061-05

明清时代的徽商群体,被不少人称作有儒商之风。所谓儒商,即儒与商的结合,是商(贾)但却好儒。对于徽商何以能以儒商知名,本文试图从思想根源上,即从徽商中流行的“贾儒相通”的观点入手来进行探讨,以期形成比较深刻的认识。

一、徽州人的“贾儒相通”观

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徽州作为程朱理学的故乡,儒风浓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以及从学、致仕、为官,长期以来一直是当地有识之士坚定的价值取向与普遍的道路选择。但宋元以后,随着徽州社会逐步陷入生存危机,徽州人也不得不面临痛苦的思想转变。他们认识到“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1]但是,弃儒崇商这种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叛逆思想,又是朱子故里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结果,在经过苦苦的探求和思索后,徽州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折衷之道,即为商为学的不矛盾性,这就是“贾儒相通”观^[2]。

用徽州人的语言来描述,这个“贾儒相通”观有3个基本点:

1. 儒求宦,商求利,功名相通振家声。徽州人认识到,从儒的目的在于仕宦,仕宦则是为了变寒

门为望族以“亢吾宗”。然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3]而且,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时代,望族的标准也变了,“素封”和以诗礼承家的文人高士一样,都已被世人看作为望族。所以,儒求仕宦,贾求厚利,这两种“功名”实际是相通的,都可以“大振家声”。在这种情况下,是从儒还是从贾,完全可以视具体情况二择一,即“拙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3]不少徽商就是这样考虑的,如歙人许太明携货商游西湖时就曾慷慨立言“人在天地间,不立身扬名,忠君济世,以显父母,即当庸绩商务,兴废补弊。”^[4]又如婺源人李大祈“惧堕其先世业,遂愤然曰‘丈夫志四方,何者非吾所当为?即不能拾朱紫以显父母,创业立家亦足以垂裕后昆。’于是弃儒服,挟策从诸父昆弟为四方游,遍历天下大都会。…业骤骤百倍于前,埽素封矣”^[5]。

2. 难为儒,先为贾,千驷万钟叠相求。汪道昆指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张一弛,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6]他的这段话是在强调,有志者不应拘泥于读书求功名的陈规,而要善于变通:如果治儒求功

[收稿日期] 2012-09-03

[基金项目] 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2012RKB38001)

[作者简介] 郑小娟,1978年生,女,福建莆田人,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电子信箱)guihuachu512@yahoo.com.cn。

名的路走不通 就“弛儒而张贾”。这里的“弛”与“张”是用弓上弦或下弦来比喻事业的兴废。也就是暂时放弃“儒” 转而去经商。待到经商成功后在“脩其利”时,为了子孙后代的前程,就“弛贾而张儒” 把经商得来的钱去培养子弟读书,求取功名。这样“一张一弛 迭相为用” 其结果就是不成为享有“万钟”食禄的高官,就可能成为拥有“千驷”实力的巨贾。这一点,在“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 往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的时代^[7],无疑是非常明智的。所以,由文献中不难看到,不少徽州土人的做法就是“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贻谋于身后”^[5]。

3. 商重利,士重义,商人士行义为利。一般来讲,商人重利,士子重义,似乎两者是对立的。但是徽州人却看到士商只是职业上的不同,商人同样可以做到重义。正如《黟县三志》卷一五《舒君遵刚传》载“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国且如此,况身家乎? …吾少有暇,必观《四书》《五经》,每夜必熟诵之,漏三下始已。其中义蕴深厚,恐终身索之不尽也。”我们从文献中可见,徽商在经营活动中“以义为利”的事例不少。如歙商黄玄赐在义礼之邦的山东经商,他“临财廉,取与义” 得到齐鲁之人的评语“非惟良贾,且为良士。”^[8] 《沙溪集略》卷四载歙人凌晋,“虽经营闾阖中,而仁义之气蔼如。与市人贸易,黠贩或蒙混其数,以多取之,不屑屑较也;或讹于少与,觉则必如其数以偿焉。然生计于是乎益殖”。由此,汪道昆总结说“司马氏曰: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9]”

二、徽商践行“贾儒相通”观的几个事迹例说

由于是以“贾儒相通”观突破了阻挡徽人从商的思想障碍,所以徽州商帮从一开始出现就带有儒宗的鲜明烙印。我们从徽商资料中,可以看到很多体现他们践行“贾儒相通”观的记载,兹举其中记载较为详明之三人事迹为例。

(一) 吴良儒

明人汪道昆的《太函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中记载其事迹:

“歙之西故以贾起富,其倾县者称‘三吴’。三吴出谿南即谿阳里长公,曰继善。是举丈夫子五人,其四以倾郡闻。季君无禄,早世居其拙。季日

自富,孺人戴乃代有终,戴以刘姬进。季君有三息子,长即处士,名良儒。处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适,既从程登仕受室,请受经为儒,戴泣下而执处士手命曰‘自而之先诸大父鼎立,而父从诸父固当岳立,不幸崩析,独不得视三公。未亡人从栖内而相形家,得而父兆吉,直将树衡霍而夷泰华,日几几于孺子望之。且而父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 处士退而深惟三,越日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 乃今自母主计而财择之,敢不惟命。’”

于是收责齐鲁,什一仅存。瞿然而思去国:‘余三千里徒以锥刀而沮,将毋即巨万何为? 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缦则中贾耳,恶用远游?’ 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戴孺人笑曰‘幸哉! 孺子以贾胜儒,吾策得矣。脱或堪舆果验,无忧子姓不儒。’…

人言诸吴固多上贾,而处士之贾也良。其握算,如析秋毫;其计赢得,如取诸外府;其发也,如贾大夫之射雉;其掇之也,如丈人之承蜩知言矣。

乃处士中年折节,谢侠少游‘吾少受命于亲,不自意儒名而贾业,幸而以贾底绩,吾其儒业而贾名。’暇则闭户翻书,摹六书古帖…尝言‘母氏夺吾儒第,以吉兆卜吾后,吾业未毕,固当为后图。’乃课诸子受经以成先志…处士捐馆武林,盖春秋六十有八。”

(二) 程锁

《太函集》卷六一的《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中记载其生平事迹:

“长公(即程锁)始结发,从乡先达受诗,无何,父客死淮海,长公哭踊且呕血,则饮泣以安母心。乃趣奔丧,父故资悉贷他人所。故竖窃资亡匿,秋毫无以为资。客请捕亡而后发丧,长公不可,‘仁者不忘丘首,孤不能以一朝居,如使急亡命而缓亲丧,无宁匍匐往矣。’…既终丧,病骨立,屏居一室,三岁不出户庭,少间,则挟策读书不辍业。母谓:‘孺子病且无以为家,第糊口四方,毋系一经为也。’长公乃结举宗贤豪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久之业骘骘起,十人者皆致不贫。”

长公中年,客溧水,其俗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长公居息市中,终岁不过什一,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

予,长公独予平价困积之。明年,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境内德长公,诵义至今不绝。…

县大夫召长公为植城休宁…宗人某子甲有难色,县大夫顾问长公,长公跪曰:‘某贫,宜不胜任,锁幸有余力,毋以一夫烦君候,请代之。’费五百缗而告成事。会城溧水,长公亦费五百缗。既则举宗梁浙江,费亦称是。…

长公以身起富,中分产,独胞弟铨,遇铨怡怡无德色。…以遗言命三子:‘吾故业中废,碌碌无所成名,生平慕王烈、陶潜为人,今已矣。尔问仁、问学,业已受经;即问策幼冲,他日必使之就学。凡吾所汲汲者,第欲尔曹明经修行,庶几古人。吾倍尔曹,尔曹当事自此始。毋从俗,毋用浮屠,毋废父命,吾瞑矣。’…

余惟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长公是已。…季年释贾归隐,拓近地为菟裘,上奉母欢,下授诸子业。暇日,乃召宾客称诗书,其人则陈达甫、江民莹、王仲房,其书则《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迄今遗风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长公尝奉诏助工,授鲁藩引礼,卒不拜,乃令仲伯受国子业,而冢孙亦学为儒。”

(三) 李大祈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中记载其事迹:

(大祈)于是弃儒服,挟策从诸父昆弟为四方游,遍历天下大都会。知留都为江南要据,爰居积于市,权子母以便民。又谓淮以南淮以北盐豔半天下,煮之不啻可以给私家,亦且可以供边饷。于是转徙维扬,出入荆楚,鲢艘蔽江,业骏骏百倍于前,埒素封矣。”

时故居积久欲颓,公倡大义,率二三昆弟鼎而新之,曰:‘吾匪以怀安,将以联子姓,聚而群处,以无废前人可矣。’故同舍数千指,靡不佩公之遗爱,而雍雍有张公艺家风云。生平犹好行其德,邻里之急,辄应之恐缓。至于驾桥梁、辟道路、建梵宇、备赈仓,类多争先义助。尝有客负廷琇公(祈父)千金,湖阴某子甲负百金者,公怜其家不克偿,遂焚券,曰:‘毋以是恩我后人。’维扬有某子甲以事罹覆家之祸,公扼腕为之不平,遂锐身捐千金为解,俾其家得保累巨万之富。人以是多其交谊。远近有质成者,得公一言,即立输平…

治家故尚俭勤,家虽饶,而恬淡自御,食不兼

味,衣不重彩,泊如也。惟是羞宗庙,飨宾客、延师傅,则必极丰腆。每以幼志未酬,属其子,乃筑环翠书屋于里之坞中,日各督之一经,而叮咛勸之曰:‘予先世躬孝悌,而勤本业,攻诗书而治礼义,以至予身,犹服贾人服,不获徼一命以光显先德,予终天不能无遗憾。然其所恃善继述、励功名、干父蛊者,将在而诸子。’以故诸子发愤下帷,次第尉起,或驰声太学,或叨选秩宗,翩翩以文章倾人耳,皆足以慰公之望也。…金粟斋曰:‘…如松峰公者(李大祈别号松峰),易儒而贾,以拓业于生前;易贾而儒,以贻谋于身后。庶几终身之慕矣。’”

以上3个例子在徽商中是非常典型的。通过观察,我们实际可以总结出徽商践行“贾儒相通”观主要的3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在处理社会关系方面,主要表现是身虽业贾,但却能尽扫市井俗态,有翩翩士君子之风。我们在徽州当地的方志、族谱以及文人笔记中可看到甚多这样的描述。如明万历年间的大学士许国,曾为本族商人许文林号竹石者写过一篇《竹石先生像祠记》,谈到许文林在一个“舟车辐辏,廛市栉比”的市镇经商,但在他身上却没有小商人的俗态:“先生手一编,坐而贾焉,自称竹石先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数以佳辰结客,觞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贾也。”又如婺源《湖溪孙氏宗谱》载:徽商孙大峦,“好与文人学士游,多闻往古嘉言懿行,开拓心胸,故能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风焉”。再如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诗人郑方山墓图志》载:徽商郑作“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楚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

第二方面,是在业务上,能够以儒术助“治生”,并获得成功。从历史上来看,在这方面春秋时代的子贡(端木赐)堪称徽商们的楷模。子贡是孔子的门徒,《史记·货殖列传》中称他学成以后,不愿意做官而去经商。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虽不甚赞同,但在事实上,孔子能够周游列国,享誉四方,却与子贡的大力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子贡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这是司马迁说的一句公道话。子贡的事迹为徽商们所仰慕,所以不少徽人常把业商称作“端木生涯”,还有把这四个字镌刻成牌匾悬挂在店堂里^[10]。文献中关于徽商以儒术助“治生”,并获得成功的并不鲜见。如《旌阳程氏宗谱》载休宁程声玉弃儒经商,“寓经

济于废著之地”，以致“获利如操左券”，“所求无不遂，所欲无不得”。《张氏通宗世谱》载张光祖“少习进士业，受春秋三传，领会奥旨”，后经商，“时或值大利害事，每引经自断，受益于圣贤心法甚多”。又如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有暇辄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便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丰南志》的《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记载他“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很快成为巨富，而且“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可见他不仅是自己获利丰厚，而且还助人致富。这样的人物还有歙商潘汀洲，其早年习贾，从商之后，“虽托于贾人而儒学益治”，他以儒术助“治生”，“或用盐豉，或用檀布，或用质剂，用游江淮吴越，务协地宜。邑中宿贾若诸汪、诸吴悉从公决策受成，皆累巨万”。为此，他曾自矜地说自己“以儒则市甲第，以贾则市素封”^[11]。

第三方面，是在对经商挣得财富的使用上，是否能实践儒家“仁者爱人”和行善积德的思想。在文献中，常可见到一些徽商在经商致富后，将一部分利润用于抚孤恤贫，兴水利筑道路以及救荒救灾等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有的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性的目的（这带有长远投资的性质），但有的可以说只是出于“仁爱”和行善积德的目的。像歙人黄长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载他“不效嗇夫，徒为自封已也。人有缓急，赴之皇皇如不及。凡阨于饥者、寒者、疾者、殁者、贫未婚者、孤未字者，率倚办翁。翁辄酬之如其愿乃止”。另外还有“嘉靖庚寅，秦地旱蝗，边陲饥馑，流离载道。翁旅寓榆林，输粟五百石助赈。”当时地方官奏报朝廷，要赐给黄长寿四品爵，授予他绥德卫指挥金事的职衔，但是黄长寿“谢弗受”。他的理由是“缘阿堵而我爵，非初心也”。也就是说他出钱做好事，并不是为了邀功，而是出于本心的行善动机。清时婺源商人詹文锡“承父命往蜀，至重庆界，洽合处有险道，名惊梦滩，悬峭壁，挽舟无径。心识之。数载后，积金颇裕，复经此处，殫数千金，凿山开道，舟陆皆便。当事嘉其行谊，勒石表曰‘詹商岭’”。他能将此事放在心上，几年后在资金允许的条件下主动出资修建，其本心也当是为了行善，以方便过往行者，而非带有功利的意图。光绪《婺源县志》的《人物孝友》部分中详细记载了詹氏的这一事迹。

三、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分析

如果说徽人服贾，“贾儒相通”观起到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徽州商帮本身就是带着“贾儒合一”的追求而出现的。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经过“贾儒合一”的过程，实现由商入儒，彻底转变的目的。即为儒是目标，而从贾只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徽人对“贾而好儒者”是分析得相当仔细的，将其分为2类：一类是“贾名而儒行”的“儒贾”，是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的；另一类是“以儒饰贾”的“贾儒”，则是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的。徽人提倡做“儒贾”，而认为“贾儒”不足取，至于原因，正如前引《太函集》卷六一的《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中评价程锁时说的“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即儒贾是符合正确的儒化发展方向的，会把一个人培养为儒士；而贾儒借助于儒术来经商，只会让其为商做得更加成功，不会促使其转化为儒，即不可能实现儒家以德教化育人的目的，对其来讲，儒的外观犹如蝉蜕一般，用完之后便会褪掉了。

由此观察，徽商的儒商化取向，应是带有极强的脱商入儒的色彩的，其经商也是在创造儒化的环境，寻求使子孙为儒，仕宦的结果。对不少徽商而言，只要有可能，他会让自己的后人，甚至自己放弃已经经营的较为成功的贾业，而改去读书治儒。在徽商文献中，不难看到这方面的例子，如《太函集》卷五二《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载“仲君故事儒，藉宗庙之灵，从舅贾而起富，乃今所不足者，非刀布也。二子能受经矣，幸毕君志而归儒。”同书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中也谈到歙人吴良儒在经商累“巨万”后，自豪地称“吾少受命于亲，不自意儒名而贾业，幸而以贾底绩，吾其儒业而贾名。”他“暇则闭户翻书，摹六书古帖……乃课诸子受经以成先志”。

其实，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商人，要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下生存和发展，并获得成功，他势必要为自己披上一层儒化的外衣。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学界所提到的明清众商帮都有个儒商化的问题，只不过儒化的程度会有所不同。徽商应该是儒化程度最深的，在一个极端上；而晋商恐怕是截然相反，在另一个极端上。比如，雍正二年刘于义在奏折中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中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朱批谕旨》卷四七中记载了雍正帝对此的批示，他说“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再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在最高统治者眼里，

晋商这个群体就是非常轻视读书仕宦的,这大概也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他们的评价。

[参 考 文 献]

- [1] (明) 汪道昆. 太函集: 卷四二 [M]. 明故程母汪孺人行状, 万历十九年刻本.
- [2] 汪雷. 论徽商之崛起 [J]. 财贸研究, 2002 (2): 14 - 19.
- [3] (明) 汪道昆. 太函集: 卷五四 [M]. 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万历十九年刻本.
- [4] 歙县许氏世谱明故青麓许公行实 [Z]. 隆庆抄本.
- [5]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明处士松峰李公行状 [Z]. 万历刊本.
- [6] (明) 汪道昆. 太函集: 卷五二 [M]. 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万历十九年刻本.
- [7] (清) 沈垚. 落帆楼文集: 卷二四 [M]. 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民国七年刻本.
- [8] 歙县竦塘黄氏宗谱黄公玄赐传 [Z]. 嘉靖四十一年刊本.
- [9] (明) 汪道昆. 太函集: 卷二九 [Z]. 范长君传, 万历十九年刻本.
- [10] 唐力行. 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 [M]. 武汉: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7: 40.
- [11] (明) 汪道昆. 太函集: 卷三四 [M]. 潘汀洲传, 万历十九年刻本.

[责任编辑: 刘丽娟]

论点摘要

马宇在《财贸经济》2009 年第 12 期发表的“外部冲击、公众预期与价格波动”一文通过回归分析、脉冲响应分析以及误差方差分解等方法实证研究了外部冲击、公众预期与我国价格水平波动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第一, 进口原材料价格变化对我国 CPI 波动影响显著。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看出进口原材料价格对 CPI 影响在当期就显现出来, 一年以后达到最大。方差分解模拟结果显示, 从长期来看进口原材料价格对 CPI 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进口原材料价格在 5% 水平下对 CPI 有显著影响。因此, 进口原材料价格对我国价格水平从供给方面形成巨大冲击。由于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从供给方面对我国价格水平带来显著冲击。

第二, 产出水平变化对 CPI 存在着重要影响。回归结果表明, GDP 增长率对本期价格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看出, GDP 增长率对 CPI 影响在第 1 期显现出来, 且为正响应, 第 7 期达到最大, 第 15 期消失。方差分解模拟结果显示, 从长期来看 GDP 增长率对 CPI 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 GDP 高速增长会导致 CPI 上涨, GDP 增幅回落会导致 CPI 回落或负增长。拉动我国 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出口和投资,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下降, 对 GDP 增长带来很大负面影响。由于经济周期原因,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出现下滑之势, 给 GDP 增长造成巨大压力。4 万亿投资计划极大遏制了 GDP 增幅下滑, 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出口下降和民间投资下降带来的压力。所以, 我国应该继续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 抵消出口下降导致的需求不足, 保证 GDP 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增长水平。

第三, 消费者信心对 CPI 波动影响不大。回归分析、方差分解模拟分析和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显示, 代表公众预期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对 CPI 影响不显著。有关理论分析认为, 预期对物价波动产生较大影响, 但是从本文实证结果看, 预期并不能对 CPI 产生显著影响。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 我国居民消费中刚性消费占比重较大, 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并不能降低这部分消费, 而高档奢侈品消费所占比重很小, 这种需求变化不会对 CPI 带来实质性影响。

总而言之, 我国 2009 年的价格水平下跌, 主要原因不是消费者信心不足和悲观预期导致的, 而主要是由于进口原材料价格下跌、出口需求下降和民间投资回落导致的。为避免落入通货紧缩的泥潭, 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和落实投资计划, 采取措施促进出口。

[责任编辑: 陈宇涵]